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 一个应然命题的实然问题

薛二勇 李 健 田士旭

[摘要] 循证是教育决策科学化的紧迫要求、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教育政策研究创新发展的需要,是教育政策应然命题的实然应对。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是基于证据,明确议程、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整政策全过程的理论、工具、方法和技术。基于最佳证据分析教育政策,增强教育政策的解释力、预测力和评估力。循证教育政策研究以理念建构、证据分级、价值研判与决策支撑为任务。其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研究域,以教育政策生命周期中的证据分级分类、最佳证据确定和运用为探究对象。教育强国建设的新时代,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高质量推进路径为:促进学科交叉研究、丰富证据来源,为证据判别打下基础;开展教育证据评估、分类分级证据,为证据选择提供条件;提升教育证据质量、建立证据链条,为证据运用创设通道;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教育数据库,为证据共享建立机制。

[关键词] 循证教育政策;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治理;教育政策;教育强国

[作者简介] 薛二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部教授;李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讲师;田士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生 (北京 10087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教育强国建设的新时期,教育政策研究的科学化成为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应然命题。科学有效的教育政策必须满足四条标准,即基于证据、政治可行、经济可支撑、政府和利益相关者赞同。^[1]“循证”源于萨科特(Sackett, D.)提出的“循证医学”。^[2]其所蕴含的科学证据本位、研究结果实践转化、后效评价止于至善的循证思想被引入公共政策领域,^[3]形成循证的科学域,逐步扩展到教育领域。基于证据是教育决策的首要标准,这就迫切地需要开展循证教育

政策研究,构建教育政策科学发展的新范式。

一、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实然价值

面对教育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复杂问题,要做出理论层面的科学回应、实践层面的有效应对,教育政策研究的思路与方式亟待优化。教育决策科学化、教育治理现代化、教育政策研究新推进,要求基于证据分析教育政策的条件与场景、程序与方法、问题与方案。

(一)教育决策科学化的紧迫需要

伴随着“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教

育问题日益多样和多变。这对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教育作为个人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的重要领域,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成为必然要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完善教育标准体系,建立贯通大中小幼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制度,及时公开监测评估、督导检查的数据和信息,为优化教育政策、改进教育教学提供科学依据。这为推进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提高教育决策科学性,加强对教育问题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储备。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这要求以更高的标准制定教育政策,应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教育需求的新变化。无论是教育决策规则和程序的完善,还是教育决策内容精准性和有效性的提升,都需要开展以“证据为基石”的循证教育政策研究。

(二)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成为党和国家重大政策文件中的高频关键词。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必然要求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应对风险挑战,必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这要求针对教育系统内外出现的突发、紧急、重大问

题做好制度设计,形成制度化、常规化的反应机制。^[4]基于最优证据进行科学分析和研判,建立教育证据分级体系,为破解教育难题、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提供依据。基于海量数据、进行证据分析,综合集成最优证据,形成回溯性与前瞻性证据体系,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撑。在最佳证据的基础上提高教育政策体系建设的解释性和预见性,及时制定、不断优化政策,更高质量地应对教育需求的变化和教育系统发展的问题。

(三)教育政策研究创新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教育政策的主要问题是证据严重不足及质量不高,政策理论基础薄弱,无法聚焦问题的关键病灶,导致政策效率损失现象。^[5]证据作为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核心要素,鲜有学者对证据本身进行探讨。^[6]证据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根源在于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不充分。循证教育改革指教育决策者以严格效果评估研究中的证据为依据,选用被证实有效的项目、产品、服务或模式的理论与实践。^[7]循证教育的制证与用证存在明显短板。制证不足,相当一部分实证研究缺乏统计学显著性的检验与分析,甚至错用、误用关联性与因果性;^[8]用证不力,证据使用的有效性与信服力不充分。循证教育政策研究国内学术脉络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循证”理念由来及演变,“循证”在教育政策中的应用,基于循证制定教育政策。^[9]二是循证教育决策理念与实践方式。^[10]三是循证教育的方法论考察。^[11]四是循证教育比较研究和国别分析。^[12]例如,探究美国循证教育的发展脉络、应用与主要经验,^[13]提出英国教育仍然面对着许多突出问题,^[14]基于循证推动教育改革^[15]。遵循证据,以确证事件或事物及其效果的真实性作为决策和实践改进的依据,是欧美教育改革的新取向。^[16]美国2001年颁布《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以下简称《NCLB》),把基于证据作为立法和执法的理念,体现循证导

向。该法中“基于科学的研究”(scientifically-based research)一词频现。^[17]20世纪90年代,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者围绕循证教育思想、教育改革成效、教学方法改进、教育决策优化等主题开展了系列研究,形成较为丰富的循证教育政策研究集群。21世纪初,我国逐步开展循证教育政策研究。但限于研究时间短,研究主题比较单一、内容比较单薄,国外研究引介较多,立足教育政策实践和决策需要进行本土化系统探讨的研究较少,需要在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中推进循证教育政策研究。

二、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缘源与内涵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是循证科学与教育政策学融合创新的交叉领域,是教育政策研究注入“循证”理念、工具、方法和技术后新的发展方向。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是在传统教育政策研究的基础上,应对外部形势发展和理论建设需要的系统化变革。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内涵认识,需要结合证据标准、质量、体系及其与其他有关学科交叉研究的复杂关系确定。循证教育政策研究在跨领域、跨学科、跨组织的互动中,介入循证的研究范式,生成新的发展路径。

(一)循证范式与循证教育发展

“循证”本意为遵循证据或基于证据。循证医学的系统化、制度化促进了循证在不同领域的转移和应用,“循证”理念扩展至教育领域。循证教育整合专业智慧和可获得的最好实验性证据制定教育指导建议。^[18]其实质是以证据为基础,促进证据与个体知识的双向互动,提升教育改进的精准性。运用最佳证据指导实践,教育理论在证据的不断验证中深化完善,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的机制。循证成为“遵循证据”进行实践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信仰。^[19]

循证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最

初指循证医学教育,旨在帮助护士基于专业知识、患者的价值观和偏好,依据最新证据做出适当临床决定的护理教育。通过循证教育缩小医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离度,达到保护病人的目的。循证教育是医学院校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以工业时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教育学基础理论,无法全面解释数字化时代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新问题,需要建立新的基本观点、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以对教育的本质、价值与目的作出新的阐释。^[21]1996年,剑桥大学哈格瑞夫兹(Hargreaves, D.)发布《教学作为基于研究专业的可能性和前景(Teaching as a Research-based Profession: Prospects and Possibilities)》,首次提出了“循证教育”概念。他主张,教师必须基于严格的科学证据,将专业智慧与最佳、最有效的经验证据整合起来进行教学决策。^[22]“循证”成为部分国家教育决策的“黄金标准”。美国的《NCLB》的制定和修正过程体现了循证思路,拉开了循证教育决策序幕。欧盟委员会成员国通过使用系统综述方法与元分析方法产生高质量的教育证据,促进教育改进。英国设立循证教育组织,创建证据资源库,提升循证能力。基于循证教育研究,应用可验证、系统性强、严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获得可靠性强、有效性高的教育证据。

循证教育是基于获得的最佳证据,考虑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意愿和影响因素,开展研究和科学决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循证教育框架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即研究者提供最佳证据、教育者基于证据教学、受教育者参与实践决策、管理者协调整个教育过程。^[23]循证教育有着相对固定的实施步骤。即明确问题,将实践问题科学化,为开展证据分析做好问题准备;检索证据,查询所有证据,包括研究观点、案例经验、调查数据等;评估验证,对证据的有效性、适用性、正当性进行评估,以确定其可用性;总结应用,对整个过程进行总

结,形成抽象化的理论结论与方案建议。随着信息技术、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个体教育经验的丰富和积累,心理、生物和学习科学的交叉融合,教育改革试点效果的监测和评价数据累积,教育证据基础已经具备。加之教育研究的大量文献、指南手册及数据评价、教育评估和调查报告等的涌现,证据的联合和验证已经具备条件。

(二)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要义

循证教育政策既遵循循证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与普通程序,又具有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的独特性;既参照医学领域药理、病理、心理相结合的循证决策原理,又具有教育作为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结果的独特性。教育政策循证决策是在可靠严谨的高质量证据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的理念和路径。^[24]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是利用证据,明确议程、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整政策全过程的理论、工具、方法和技术。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要义体现为四个方面。第一,突破教育政策理论与实践鸿沟,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同时,运用证据反哺理论的优化。第二,证据是关键要素,从教育者、决策者、研究者、学习者等多主体角度,建立证据库,构建证据之间的链接机制,形成证据链,确立基于最佳证据决策的黄金法则。第三,教育政策不仅要基于个体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还要将政策受众的意愿和价值取向作为依据,纳入决策证据体系。第四,教育证据的使用、判断、纳入,主要依据其时代背景、发展形势、外部挑战、内部要素、价值定位等做出判断。(见图1)



图1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要素与要义

(三)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功能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是运用最佳证

据做出决策,建立政策与结果的关联性和因果关系,推行最有效的方案,影响学校建设、教师发展和学生成长,提升教育质量。循证教育政策研究过程中始终需要回答四个问题,即教育政策问题是什么;有什么证据和确定的问题相互关联;怎样判别证据的效力,是否需要创设新的证据;通过什么方法利用证据,以获得最佳方案与路径。基于证据体系,决策者制定和优化教育政策、管理者构建和形成有效的教育管理办法、教学者推进和实施科学的教学方案和策略。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功能主要为解释、预测、评估教育政策,其作用发挥体现为解释力、预测力和评估力。第一,解释教育政策,发挥科学解释力。针对政策文本的理解、宣传、解读,基于证据将教育政策进行分解糅合,形成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使执行者、执行对象、社会公众对政策内容、要求和目标的认识更为深入全面,推进政策执行。第二,预测教育政策,发挥有效预测力。证据关联分析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功能,能够预测教育政策推进的方向和路径,为方案选择提供高精度的效果预测。在有效证据汇聚、研判和关联分析的基础上,预判政策制定、执行和调整的内容、节点与变化方向。第三,评估教育政策,发挥精准评估力。针对教育政策全过程,全面收集和分析数据,形成有效证据链,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客观判断和检测。

三、循证教育政策研究基础与框架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以多种学科的循证发展为基础,以证据的搜集、分类、评价和运用为着力之处,推进教育政策科学发展。基于政策过程理论,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步骤为,提出问题、寻找证据、综合评价证据、整合专业知识和智慧、形成教育政策方案。

(一)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目标任务

循证与教育政策的结合为新时代教育政

策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为解决教育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断层问题提供了方法指引。欧美国家近十年来兴起的以证据为本的教育政策研究范式,与我国教育决策科学化的推进,本质要求是一致的。循证教育政策研究以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改进教育实践为目标。其核心任务是围绕循证的理念、证据、价值与决策展开系统探究,以证据意识唤醒和证据质量提升,在政策制定、执行与调整中纳入证据体系和价值考量。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与传统教育政策研究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第一,目的指向不同。传统教育政策以理论和实践需要为出发点,运用政策原理和已有材料加以分析和解决。循证教育政策以教育实践改进为出发点,运用循证政策原理、证据体系加以分析和解决。第二,研究依据不同。传统教育政策研究主要依据理论知识和逻辑推演,特定群体与实践的经验、归纳和总结,调查研究与观察分析等。循证教育政策提倡,将经过科学研究的、实践改进的主要发现作为重要依据,将决策建立在最佳科学证据基础上。循证教育决策是决策者将能够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置于制定与实施政策的核心,根据多方面信息,结合专业人员的智慧与价值观来作出决定。^[25]第三,证据要求不同。传统教育政策研究中,所选取的证据往往不分等级,以有限证据为基础开展分析研判;循证教育政策研究强调,评估所有能够查询和发现的证据,对证据效力进行分级评价,将最高等级证据作为重要依据。

(二)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科基础

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程分三个阶段:运用实证研究,实现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形成社会技术,实现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化;推进循证实践,实现实践领域的科学化。^[26]“实证”指向学术领域内的基础研究,“循证”指向实践形态或方式。^[27]循证教育将主要基于体会、常识、经验、个体觉察、验证不足的教育实

践范式,转变为严格遵循有效证据,以最佳证据、最优实践为基础改进教育质量。循证实践中严格遵循的证据可以是观点、例证、迹象。^[28]但通常是,由严谨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科学发现或成果。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不是传统教育政策研究的替代,而是原有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更新,呈现综合化的特点,具有多种学科交叉研究属性。教育政策研究的全新综合特征,使其具有社会科学或元社会科学的某些意义。^[29]循证教育政策应对复杂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特点。其学科基础包含循证教育、循证医学、循证决策、循证心理、循证生物、信息科学等的理论、工具、方法和技术。交叉学科的不断发展为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推进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其理论创新发展的依据、来源和基础。

(三)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框架

循证教育政策的基础理论框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以教育政策的议程、制定、执行、调整等全过程生命周期中的证据分级分类、最佳证据确定和运用为探究分析的对象。第二,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教育证据综合集成法、教育决策情景分析法、教育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法、教育要素系统分析法等方法,基于计算机设备的运算能力和人的经验判断能力,根据偶然、极端、最可能教育政策情景,充分考量利益相关者的教育权益和行为,判断教育要素的组合方式,提出基于最优证据的教育政策方案。尤其是,运用元分析或系统分析方法,推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事实研究和规范研究的互动与融合。根据具体教育政策问题,运用标准一致但有差异的证据收集、分析、评估方法。第三,理论工具。综合理性决策、非理性决策和有限理性决策的理论假设,在渐进决策模型、团体决策模型、博弈决策模型等中引入证据因素,优化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型。循证教育政策引入证据分级、质量评定理论,运用多

准则决策、群决策、行为决策、不确定决策的理论工具,[30]构建基于证据的教育政策理论工具。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基于证据,对教育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优化等进行全过程分析,形成全链条教育政策研究范式,丰富科学、理性认识教育政策问题的知识体系。依据基本理论、方式方法、决策模型、证据分级、工具技术、监测评估、优化路径的逻辑路线,呈现科学的循证政策研究范式,为利用循证工具研究教育政策问题提供基本思路。

四、循证教育政策研究工具与路向

“证据本位”是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本质所在。与普通信息不同,证据往往是清晰的、易被理解的,[31]通常具有高度的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和有效性等特征。基于证据,在教育需求、教育目标、教育资源、教育结果之间建立相互链接的政策过程体系。在教育需求和教育目标之间建立链接,判断政策方案是否满足教育需求、是否能够达成教育目标,形成政策方案假设。在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结果产出之间建立链接,分析教育资源运用是否具备效率并能够获得相应的教育结果,形成政策效率判断。在教育目标与教育结果之间建立链接,分析教育目标和教育结果是否匹配并具备高的一致性,形成政策效益判断。在教育需求与教育结果之间建立链接,分析教育结果是否满足教育需求并具备高的相关性,形成政策影响判断。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推进路径主要体现为跨学科的交叉融合、证据的分类分级、证据链的建立和运用、大数据的抓取和测算等。(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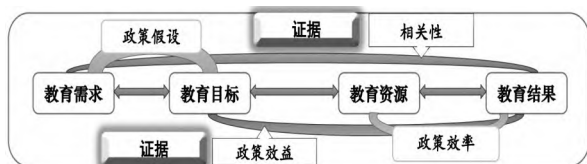


图2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推进关系图谱

(一)推进学科交叉研究、丰富证据来源

循证教育是跨人文、社会、自然三界的学科。[32]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证据来源是多学科、跨学科性质的,与教育问题相关的所有研究和数据都应该成为循证教育政策的依据。证据指导的教育实践也是跨学科的。[33]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跨学科研究,如此倾向于在合作研究中实现知识大融通。[34]在知识经济社会中,跨学科研究成为学科知识创新的常态,学科间的互动融通愈加频繁。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不再是被动、单向地接受他者既有的理论思想资源,而是跨学科互动中合作研究的关系。[35]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其建设和发展,若仅靠单一学科支撑必定走不通,不具有可持续性和发展后劲,必须形成跨学科的研究组织。跨学科开展循证教育政策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为,教育知识分化、专门化导致的证据碎片化。循证教育政策研究者要对自身学科之外的学科始终保持理解、尊重立场,对学科创新持开放态度。有关部门和机构创新教育科研评价制度,综合纳入不同学科的评价标准,鼓励研究者跳出传统学科束缚,参与跨学科研究。建立健全跨学科研究团队,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开展循证教育政策研究。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作为复杂工程,需要系统化协同推进。政府主导,在教育领域设立基于证据的学科、科研项目、研究院所及行业协会。国家、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协作,在教育学科下设置循证教育政策的研究方向或二级学科,成立促进循证研究的委员会,增加循证研究背景的专家,优化同行评议专家组成。构建跨领域、跨组织、跨部门的协作机制,创新考核激励办法,加大政策、科研和社会舆论的引导。在国家科研项目中,专门设置循证教育政策研究项目,引导科研工作者基于研究基础和现实需要开展专深研究,形成研究域。构建中央和地方协同一体的循证

教育政策研究体系,支撑基于证据的教育智库建设和教育决策活动。设置循证教育政策研究岗位,设立专门性的评价通道,完善专职兼职相结合的聘任制度,引导研究者、实践者、决策者共同参与循证研究。制定明确清晰的筛选标准,建立循证教育政策研究共享平台,对研究成果进行客观、专业、用户友好式整合,推进证据的互认共享。

(二)开展教育证据评估、分类分级证据

证据的本质为信息,高质量的信息分析和运用,决定了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质量。信息来源和表现多样,主要有专家知识、研究文献、发展数据、政策建议、评估报告、网络舆情,以及教育统计信息、教育方案文本、教育利益关系等。在任何政策领域,实践者与管理者都有大量的证据。多数情况下,他们比决策者更清楚为什么情况如此,以及为什么以前的举措会失败。^[36]面对类型多样、内容庞杂的教育政策证据,为了有效利用证据决策,需要对证据的相关性和质量进行评估与分级。以此明确,证据是否能回答拟要解决的教育政策问题,产生证据的环境与实际决策环境是否足够相似。

基于关联程度,教育政策证据大体分为两大类,一是间接证据,指国内外教育科学研究的发现、成果、数据及元分析的结果等;二是直接证据,指教育决策者、研究者和利益相关者的经验体悟、实践知识、政策变通、政策建议等。基于来源,教育政策证据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结果证据、过程证据或执行性证据;二是描述性证据,分析性、批评性、伦理性证据;三是数字证据、文字证据。^[37]基于效力,证据分为硬性的教育客观证据和软性的教育主观证据。^[38]硬性的教育客观证据是通过试点、试验、实验、调查和观察等收集的量化数据,通过访谈、问卷、座谈等收集的结构化数据、访谈文本信息和统计数据等;软性的教育主观证据是教育口述史、教育日记与反思、教育类文学和视频资料、教育活动照片和

报道等。教育证据质量的等级,按照其方法的严格程度划分为六个层面,由严到宽形成六个层次的金字塔模型,分别为随机实验、准实验研究、前后对比研究、相关研究、个案研究、传言或掌故。^[39]政府主导、教育科研机构推进、行业参与、技术支撑,建立健全证据分类体系,基于宏观、中观、微观教育政策问题,建立高、中、低三种水平的证据标准、认定程序和收录办法。根据证据级别和种类,将适合特定情景的、可获得的最佳证据作为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核心支撑。如果最佳证据缺失、不可获得或不符合特定场景,则运用能够获得的次优证据。以此类推,直至解决教育政策问题。

(三)提升教育证据质量、建立证据链条

证据质量和共享机制是循证教育政策深入开展的基础。利用教育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与文献存量证据;在存量证据缺乏、存在疑问、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探索并建立新的证据。^[40]政府有关部门加大投入,构建教育政策证据体系和数据库,引导学校教育、科研院所、社会机构塑造证据文化氛围,改变与优化循证实践。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大规模教育政策证据搜集的常态化机制,统合各级各类教育实验数据、经验数据(教育决策、教育管理、教育教学经验等)、研究数据(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混合研究、试验研究、实验研究、行动研究等)、政策文本、监测数据等。政策引导与多方力量相结合,增加教育证据的数量。在数量的基础上,改进教育政策证据提取的方法和技术,提升证据搜集、运用、分析全过程的质量。

证据链条是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持续发展的依托。教育理论、假设或猜想必须以清晰、毫不含糊和可实证检验的术语来陈述,证据必须通过清晰的推理链与其联系。^[41]教育研究者提供最为关键的专业证据,对教育决策与实践改进具有重要意义。学校、教师、学生是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最大获益者。但通常

情况下,教师对日常教育教学实践反思与反馈的积极性不高,其很可能断然否决所有与其经验相抵触的学术成果。^[42]再加上,反思与反馈标准缺乏,导致教育研究与实践的鸿沟。而且,教育决策循证范式尚处于起步阶段,传统专家咨询类、逻辑论证类、群体座谈类决策路径,仍然是教育行政部门决策的主要路径。^[43]政府和社会协同,提供证据资源和鼓励应用的资金,引导和帮助教育实践者选择和应用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案,逐渐形成循证观念。通过培训、观察、考察、参与等措施,引导教育决策者与实践者主动运用循证知识、方法和技术,自主自觉进行基于证据的决策。政府主导、社会机构参与相结合,建立证据研发、效果评估、证据整合、学校改进的证据体系,建立健全证据共享的体制机制,使证据在学术界、实践界、决策界自由流动,将证据运用于教育政策决策、学校管理实践、教师教育教学。教育研究者、实践者、决策者共同参与构建证据体系,推进循证教育政策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四)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教育数据库

信息化时代的重要表征,是大数据的产生和运用。大数据为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提供有效支撑。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为代表的大数据技术迅猛发展,记录和共享数据达到前所未有的量级,多模态的教育数据采集方式层出不穷,实时的海量教育数据不断累积。^[44]在大数据背景下,传统的教育决策正在从以管理流程为主的线性范式,向以数据为中心的扁平范式转变。在教育决策中,参与方的角色和相关信息流向更趋多元与交互,为推动教育管理由“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变提供了机遇,为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契机。^[45]利用大数据技术,有效评价教育政策方案的效益、预测教育政策实施效果、提高教育决策效能,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在政策议程到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预测和把控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提供尽可能充

分的信息,优化政策过程。通过大数据的海量信息抓取和迅速计算,准确地感知和挖掘教育需求;基于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运算能力,及时有效地获得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和调整过程中的反馈信息,推进政策决策和研究的优化。建立健全教育政策数据库,形成风险预警机制,为及时发现问题、预警舆情、化解风险提供基础支撑。

基于教育大数据,改变证据采集、储存、分析、运用等的方式和效率,建立教育政策纠偏调控机制。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协作,将大数据引入教育政策决策。在教育大数据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建立人力、物力、财力协同投入的体制机制。制定系列性的数据搜集和分析标准,挖掘个体经验、研究发现、试点效果与国际经验,优化升级教育政策证据系统。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协作,多部门协同,建立统一的教育政策数据库,有机联合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机构的教育数据,统合个体教育教学、研究者教育科研、国家教育决策的各种数据,建设循证教育政策的证据库。

循证教育政策研究尚需对中国教育政策独特的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分析,对教育政策科学化应然命题做出实然的应答,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效支撑。结合中国教育情景,基于教育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求,针对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超越传统的理论假设,寻找循证教育政策理论和方法的突破口。有机衔接理论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到研究的“顶天立地”,推动循证教育政策的思想理论、工具模型、技术方法、应用模式的不断优化,支撑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和教育强国建设。个体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决定了,教育政策并非证据简单叠加的过程;教育效果显现的长期性和滞后性决定了,教育测量并非数据量化表达的过程;教育智慧的养成和发挥决定了,教育教学并非统一规定模式的过程。应科学认识循证教育政策研究

的限度,避免陷入证据的陷阱,盲目进行教育数据崇拜。

参考文献:

[1] UNESCO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 UNESCO Handbook on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nd Programming[R]. Bangkok: UNESCO Bangkok, 2013. 6—7.

[2] Sackett D. L., et al.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6, (7023).

[3] Behague, D., et al.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the Implications of Globally-applicable research for Context-specific Problem-solv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9, (10).

[4] 薛二勇,李健. 主动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的教育体制机制构建[J]. 中国教育学报, 2020, (3).

[5] 张正严,李侠. “基于证据”制定教育政策[J]. 教师教育学报, 2017, (1).

[6] 陈秋怡. 基于证据——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趋势[J]. 现代教育管理, 2017, (6).

[7] Slavin, R. E. Evidence-based Reform in Education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students placed at risk, 2017, (3).

[8] 任萍萍,李鑫. 循证教育研究:缘起、困境、体系框架与实施建议[J]. 中国电化教育, 2021, (12).

[9] 张琦. 遵循循证原则 制订教育政策[J]. 中国教育学报, 2007, (7).

[10] 周加仙. 走向循证教育决策与实践[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7, (6).

[11][32] 徐文彬,彭亮. 循证教育的方法论考察[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4, (4).

[12] 洪成文,莫蕾钰. “基于证据”教育政策研究的评估与整合——以英国EPPi与美国WWC的经验为例[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6).

[13] 邓敏杰,等. 美国循证教育的发展脉络、应用与主要经验[J]. 比较教育研究, 2019, (4).

[14] 桑锦龙. 为教育政策提供证据——当前英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特点及启示[J]. 教育科学研究, 2012, (1).

[15] 李霞. 循证教育:英国的实践探索[J]. 比较教育研究, 2021, (8).

[16] Hargreaves, D. Teaching As a Research-based Profession: Possibilities and Prospects (The Teacher Training Agency Lecture 1996) [A]. Hammersley M.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C]. CA: SAGE, 2007. 3—17.

[17] Robert, E. S.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ies: Transform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2, (7).

[18] 陈进,等. 循证教育的产生与内涵[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9, (10).

[19] 钱洪良. 论循证视角下的证据科学[J]. 证据科学, 2013, (55).

[20] Song, C. E., et al. An Analysi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ourses in Korean Nursing Education Systems [J]. Hehiyon, 2019, (10).

[21] 刘复兴. 论教育与机器的关系[J]. 教育研究, 2019, (11).

[22] 梁有道,等. 循证实践理念和方法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9, (2).

[23] 杨文登,叶浩生. 缩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基于循证教育学的视野[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0, (3).

[24] 杨烁,余凯. 我国教育政策循证决策的困境及突破[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9, (10).

[25] Davies, P. What Is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1999, (2).

[26] 杨文登,叶浩生. 社会科学的三次“科学化”浪潮:从实证研究、社会技术到循证实践[J]. 社会科学, 2012, (8).

[27] 杨文登. 循证实践:一种新的实践形态[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 (4).

[28] 俞可,等. 循证:欧盟教育实证研究新趋向[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 (3).

[29] 祁占勇,等. 中国教育政策学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J]. 教育研究, 2016, (8).

[30] 毕功兵,等. 中国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资助与进展分析[J]. 管理学报, 2014, (3).

[31][39] Honig, M. I., Coburn C. 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 in School District Central Offices: Toward a Policy and Research Agenda[J]. Educational Policy, 2008, (4).

[33] 柳春艳,等. 发展中的循证教育学:多元特征与研究前景[J]. 图书与情报, 2018, (3).

[34] 爱德华·威尔逊. 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6. 19—20.

[35] 李政涛. 教育学的边界与教育科学的未来——走向独特且独立的“教育科学”[J]. 教育研究, 2018, (4).

[36] Quinn, M. Evidence Based or People Based Policy Making? A View from Wales [J]. Public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02, (3).

[37] 陈霜叶,等. 大数据时代的教育政策证据:以证据为本理念对中国教育治理现代化与决策科学化的启示[J]. 全球教育展望, 2014, (2).

[38] Marston, G., Watts R. Tampering with the Evidence: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J]. Australian Review of Public Affairs, 2003, (3).

[40] Davies, P. What Is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1999, (2).

[41] Richard, J., et 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 Education [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02. 18.

[42] Hargreaves, A., Stone-Johnson, C. Evidence-informed Change and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A]. Bransford J., et al. The Role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Improvement [C]. Cambridge: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09. 29.

[43] 宋萑,等. 职前教师培养实证研究的系统文献述评

(2015—2019)[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9).

[45] 刘三女牙,等. 计算教育学:内涵与进路[J]. 教育研究,

[44] 郑永和,等. 计算教育学论纲:立场、范式与体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6).

2020,(3).

On an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y: A Reality-Based Problem in a Necessity-Based Topic

Xue Eryong, Li Jian & Tian Shixu

Abstract: Evidence-based inquiry is required in the urgent scientific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the modernized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serves as a reality-based strategy for the necessity-based topic in educational policies.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indicates theories, tool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hrough which we follow evidence to clarify the policy agenda, formulate the policy, implement it, and adjust its whole process. We need to use the best evidence to analyze an educational policy, and enhance its explanatory power, predictive power and evaluative power.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shoulders the tasks of constructing concepts, classifying evidence, judging the value, and supporting decision-making. A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t probes in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evidence in the life cycle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deter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best evidence. In the new era, when we are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the approaches to the high-quality promotion of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include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nriching the sources of evidence, and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evidence judgment; evaluating, classifying and grading educational evidence, and providing conditions for evidence selecti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al evidence, establishing chains of evidence, and creating channels for the use of evidence; and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to build an educational database, and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evidence sharing.

Key words: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y;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educational governance; educational policy;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Authors: Xue Eryong, Deputy Dean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olicy, and professor of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 Jian, lecturer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ian Shixu, doctoral candidate of the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Key Research Institute in Univers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责任编辑:杨雅文]